

中国流行音乐现状

动荡节拍

白岩松



当下华语流行音乐不平庸的一切，
都像是那个伟大时代的长长回声。

中国流行音乐现状

动荡节拍

白岩松



几句开场白

当节拍不再动荡

文 / 白岩松

1993年，当我为中国流行音乐写完这几万字“小史”的时候，我以为：一个伟大的流行音乐时代即将开始！没想到，仅仅一两年之后，华语流行音乐最伟大的时代走向落幕。于是，书中的这些文字，也便由我以为的冲锋号变成了挽歌。

没办法，人们永远无法看清自己所处的时代。

一

写这些文字来自我的热爱，当然，也因为当时的我有大把的时间可用。

那时，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报》供职，业务熟了，时间就多出来。于是，只要有时间，就盯着流行音乐不放，又听又观察还琢磨着。

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崔健带动的摇滚热潮突然兴旺蓬勃起来，唐朝、黑豹、超载、轮回……摇滚正拔地而起，再加上齐秦、童安格、张学友、赵传、苏芮……一系列显赫的名字，不断用新专辑冲击并打动着你。仅仅听似乎不够了，觉得自己还该写些什么。可能正是在听完唐朝或黑豹的盒带不久，我开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写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画个素描般的历史，也顺手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进去，然后，就有了“动荡节拍——中国流行音乐现状”这个概念。

二

最初的文字并没有这么多。1992年3月24日开始，我只是一篇接一篇写着，然后一篇接一篇刊登在我供职的《中国广播报》上，近水楼台，稿费没有，但版面还是有的。也正是因为是在自家的田地上，版面虽有，可并不富裕，于是，每篇都不太长，大约两千字左右或略长，八篇下来，也不过一两万字。写完登出来，一件事儿算做完，又继续踢球喝酒听歌挥霍青春去了。对了，那一年，我二十四岁。

三

然而，当时的《中国广播报》还真是有很多人看的。

有一天，好像是接到了一个电话（又或者是收到了一封来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位编辑，说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中国流行音乐现状”系列，觉得不错，问可不可以将篇幅扩充一下，发到他们的一本杂志书里（杂志大小，登三四篇几万字的文章，不像书也不像杂志）。

听到邀请，一愣，有点儿小意外，可能也有点儿小骄傲。杂志书也是书啊，难道我也有文字要被出版了吗？也就是在这小骄傲的情绪中应承了下来。于是，就有了今天您看到的这些文字。

四

幸亏有了这个邀请，从一万多字扩到七八万字，过程并非“注水”，而是的确有太多东西要加进去。

我最初写这些文字的1992年春天，一直到扩充这本小书的1993年上半年，是中国时局与社会变化巨大的岁月，从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开始，中国这列车就似乎突然提速，不仅经济，也包括文化等方方面面。更何况，伴随这种变化的，恰恰是开放开明的新空气。流行音乐也似乎一夜之间有了希望，摇滚乐也压不住地生长。几个月的时间，都会多出不少新乐队、新节奏、新旋律。

好像没用太长时间，我就完成了出版社的任务；又隔一段时间，一本今天看来很粗糙的杂志书摆放到我的面前。不过这时，我的注意力已有所转移，我自己已投身到《东方时空》的创业洪流中。对于我个人来说，人生中一个全新的“动荡节拍”开始了。

五

其实，一开始，我拒绝了中央电视台要将我调过去的邀请，因为当时在《中国广播报》，我已着手创办另外一份报纸——《流行音乐世界》，万事俱备，只欠最高领导签批。可惜，1993年中期，当时的广电部部长毙掉了这张报纸：流行音乐还办什么报纸！

可见，即便邓公南巡之后，流行音乐的生长环境也乍暖还寒，而我本人，就一气之下，转投中央电视台，走上了新闻主持人的道路。

不过，即便到今天，我的视线从未离开过中国流行音乐，那不仅是我的青春，还是我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六

只可惜，当下这个时代，唱歌的人越来越多，可唱的歌却越来越少。

华语流行音乐，从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发端，到80年代达到高峰，90年代中期逐渐衰退，一个伟大的周期走完了它的路程。

近十几年，台湾如果没有周杰伦怎么办？

近十几年，香港如果没有陈奕迅怎么办？

近十几年，大陆如果没有电视上的选秀节目怎么办？

当然，我们有痛仰、有周云蓬、有谢天笑、有汪峰，可是，这一切都像是那个伟大时代的长长回声。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并未开启一个华语流行音乐新的时代。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平庸平常着。或许，这不是流行音乐的责任，是我们的生活与时代，都平庸平常着。

又或许，这就叫小康生活。

七

没什么可抱怨的。当有人怀旧的时候，我总是一笑走开。我习惯感恩并庆幸，在自己的青春年华，与那个华语音乐最好的时代有过相逢，并用文字深深拥抱过。

这可能就是这些文字的意义吧。只是不知于您，又有何意义？不过，为尊重历史，这些文字，我只字未改，哪怕有那么多的错误与无知。

2016年3月

目 录

CONTENTS

从零开始：流行音乐活力四射	/ 001
潮来潮往：却道作今不如昔	/ 010
乘虚而入：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 020
盛名之下：港台有实难副	/ 029
风霜雪雨：摇滚乐突飞猛进	/ 039
急功近利：盗版日渐猖獗	/ 047
唯我独尊：找寻自己的创作	/ 054
流行音乐：重新计划现在	/ 061

从零开始：流行音乐活力四射

从《小城故事》到《乡恋》，初起步的流行音乐在大陆就像一支孩童手中的万花筒，变化出千奇百怪的色彩。为此，习惯了平静的人们以各种目光，出发于不同的角落，纷纷评说。

20世纪70年代末，对于刚刚从噩梦中苏醒过来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摇摇摆摆的年代。改革开放，使阻挡在中国百姓面前的高墙轰然坍塌。世界以它本来的缤纷色彩呈现出来，令麻木了很久的中国人为之惊奇、为之诧异。

当喇叭裤、大背头、砖头式录音机、邓丽君作为“资本主义”第一代“文化入侵者”行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时，人们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一时间，高兴、生气、悲伤、愤恨……各种情绪倾泻而出。但没过几年，喇叭裤、大背头便由于服装流行趋势的变化和中国人审美眼光的变迁悄然地消失无踪了。然而，以砖头式录音机和邓丽君为起步的流行音乐却在大陆从私下到公开，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到大多数人的消费品，曲曲折折地一路走来，慢慢演化成社会文化的一个强大分支，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最早的邓丽君歌声，让人首先感到的是新奇，已经听惯了高亢激昂的耳朵迅速在邓丽君的柔和声线里发现了心灵的绿洲。在“文化沙漠”年代中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百姓，以饥渴的心情使邓丽君、刘文正迅速在人群中扩散开来。不过，这时候中国百姓接触流行音乐还有一种偷吃禁果的感觉。报纸、杂志上不时会出现声讨、批评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的文章，斥之为“黄色的东西”、“靡靡之音”、“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特有产物”。

然而，邓丽君屡禁不绝。可以说，在那样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里，邓丽君、刘文正这些港台歌手以人们无法抗拒的新奇和全新的感染力，培养了大陆庞大的流行歌迷群体；同时，也使闭塞很久的中国音乐界感受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冲击；而大陆一些热爱流行音乐的青年人，在听邓丽君、刘文正的同时，慢慢以模仿的方式缩短着自己和流行音乐之间的距离，为以后涌现出大批流行歌手奠定了技术基础，这其中包括赵莉、朱晓琳、程琳等一批拓荒歌手。

就在大陆音乐界、新闻界纷纷扬扬对邓丽君展开争论和评判的时候，中国音乐圈突然“后院着火”，为这场是“靡靡之音”还是“艺术”的争论制造了新的新闻由头。

1979年年底，权威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电视专题片《三峡传说》，这部片子本身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然而作为这部电视专题片的主题歌，却在音乐界乃至全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

“你的身影 / 你的歌声 / 永远留在 / 我的心中 / 昨天虽已消失 / 今天却又和你相逢……”

这首《乡恋》由马靖华作词，张丕基作曲，由当时大陆最走红的女歌唱家李谷一演唱。歌曲运用了电声乐队伴奏，旋律优美，词意清新。然而，引起人们关注的并不在于歌曲本身，而在于李谷一在演唱这首歌时运用了气声唱法，让人很快便联想到港台流行歌曲。首先对此表示批评态度的观念大致为：“放弃自己民族的东西，向港台庸俗文化靠拢”；“演唱风格低下”；“港台怎么唱我们不管也管不着，但是我们这个一向有优良艺术传统的国度，绝不应当出现这种‘下流的东西’”。如果说，以上这些观念还有些“艺术”的味道，那么“崇洋媚外”、“是不是党培养了多年的音乐工作者”、“亡党亡国的前奏曲”等指责，在今天看来，便是忧虑之心过于沉重了。

几年之后，人们便已经习惯于把《乡恋》看作是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第一首成功之作。事实上，正是由此，大陆的创作者才开始投身于流行音乐这种全新艺术形式的创作之中，也正是由此，大陆的流行音乐才开始努力摆脱港台的阴影，在自己的道路上蹒跚起步。

从《军港之夜》到《夜色阑珊》，流行音乐在依旧的众说纷纭中壮大着自己。“走自己的路”与“他山之石来攻玉”并存。

随着对邓丽君、对《乡恋》争论的纷乱无绪，和最后的不了了之，流行音乐在大陆摇摇晃晃地站稳了脚跟，开始了生长的过程。

1980年，北京举办了一次“新星新秀音乐会”，这场引起国人广泛关注的音乐会，向社会展示了大陆流行音乐的最初创作成果，并推出苏小明、朱明瑛、郑绪岚等一批歌手，让歌迷们知道，除了邓丽君等港台歌手以外，流行音乐中还有

我们自己的名字。在这场音乐会留下的一张照片上，站在歌手最中间的是苏小明。随着《军港之夜》《幸福不是毛毛雨》等歌曲的大范围传唱，苏小明成为那个年代最走红的歌手，在大都市几乎到了无人不晓的地步，并拥有了大量的狂热歌迷，使歌坛明星崇拜第一次在大陆成为现实。

1980年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歌曲》编辑部举办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十五首”评选活动，入选的十五首歌曲展示了大陆创作者的初步实力。

入选的作品包括《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响》《太阳岛上》《我们的明天比蜜甜》《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等，这十五首歌由于完全是群众投票评选，因而代表了那时人们的欣赏口味。

《中国文艺年鉴》归纳1980年乐坛争论的三个问题中，包括对十五首获奖广播歌曲的争论。另两个争论，一是关于流行歌曲，二是关于《何日君再来》，可以说争论全部集中在流行音乐上。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十五首歌没有时代的特点，越听越软，向“流行歌曲”靠近，反映了创作的一种倾向。

这场争论最后以有关领导的“总体肯定”宣告结束，但仍然指出了此次评选的缺点，没有采取群众、专家、领导三结合的方式。

争论很快过去，80年代初，中国歌坛呈现出活跃的景象。那个时期最流行的歌曲包括三种：一是港台爱情歌曲；二是以《赤足走在田埂上》《外婆的澎湖湾》为代表的台湾校园歌曲；三是以十五首获奖歌曲为代表的我国首创歌曲。流行音乐已经开始深入人心。

但是从严格意义来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流行音乐还基本停留在“史前状态”。这种“史前状态”主要表现为歌词白话直露，没有多少人们内心的真实情感，口号式、赞美式的歌词不绝于耳，离人们的距离依旧很远。此外，从对比的角度来说，大陆歌曲的自创性依然很弱，除了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周峰的《等到明年这一天》等歌曲之外，占据大陆流行乐坛的主要是刘文正和邓丽君的歌曲。从专辑推出的质量来说，大陆还是刚刚起步，歌曲的配器单调简单，缺少层次，录音技术粗糙。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时期的歌手素质参差不齐，高的实际属于艺术家的范畴，而低的连乐谱都不识。很多人是以模仿邓丽君起家的，所受的训练很少，唯一的老师就是“砖头式”录音机。这种歌手，只能在介绍港台作品中走得很远，而无法为歌迷带来自己的东西。

此时的大陆流行音乐，并没有被社会当作一种艺术形式来看待。但是，这段“史

前状态”时期，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

在理论上，争论使流行音乐“合法化”，对邓丽君、李谷一《乡恋》的争论过后，苏小明、程琳又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评判，她们两人是否出面竟成了测试政策的晴雨表。直至1984年，仍有大陆音乐杂志对台湾罗大佑的《童年》这首歌展开争论。这以后，社会上仍有人对“流行音乐在大陆蔓延”表示出焦虑的心情。这一切，都流露出那个年代对新事物接受的难度。

就音乐本身来看，这个时期大量介绍了外部作品，无论是台湾还是欧美的流行音乐，都通过各种媒介出现在大陆歌迷的面前。像周峰在80年代中期推出的《眼之魅》专辑，就收录了当时正流行于欧洲的劲歌《我爱肖邦》和风行美国的《哈罗》等曲目。同时，大陆音像界通过“扒带”的方式把域外流行曲目大量呈现在“贫穷”的歌迷面前，也使大陆流行音乐工作者在借鉴中提高着自己对流行音乐的认识。

这个时期，中国大陆的改革蓬勃发展，中国一年一个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改革开放，使得大陆音乐青年有机会得知国外流行音乐的发展程度，迈克尔·杰克逊、莱昂纳尔·里奇、乔治·哈里森、鲍勃·迪伦、滚石、披头士、摇滚、重金属、迪斯科、布鲁斯，这些过去人们闻所未闻的名字，歌迷们不再陌生，一些新人、新的音乐形式，开始为流行音乐在中国发生质的变化，而做着音乐和人员上的准备。

他们正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把流行音乐在大陆提升到一个新水准的时机。

从《我们是世界》到《让世界充满爱》，借助世界和平年的圣洁，中国流行音乐以积极的正面形象站立在国人面前。当歌手齐声高唱《让世界充满爱》之后，社会终于伸出双手，以一颗爱心拥抱了流行音乐这个新生儿。

美国洛杉矶，1985年1月28日黄昏时分，这是世界流行音乐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夜晚。

晚上9时，全美40余名最有声望的歌星聚集在一间大录音棚里，他们要进行一次空前的合作——为援非募捐录制一张唱片。这张唱片就是后来风靡全世界的《WE ARE THE WORLD》，即《我们是世界》。

这些蜚声世界的歌坛巨星，包括迈克尔·杰克逊、昆西·琼斯、保罗·西蒙、肯尼·罗杰斯、莱昂纳尔·里奇等46人，每个人都拥有众多如醉如狂的听众，但他们之间，除了在比赛中间台角逐以外，彼此很少来往，更不会合作演出。而今，非洲遭受的这一场巨大灾难，却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是世界》是这次援非义演的主题歌，作者是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由迈克尔·杰克逊这位世界流行乐坛的天王巨星，在这首由40多人轮番演唱的援非主题歌中担任领唱。

1985年4月5日，星期五，是为非洲赈灾的高潮。这一天，世界各地有8000多个电台同时播放了这首歌。《我们是世界》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

中国流行音乐工作者同样在《我们是世界》圣洁而宏大的气势中感受到自身的责任。没过多久，台湾流行音乐奇才罗大佑作词作曲创作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汇集台湾三四十位歌手合力推出，这首歌迅速在大陆广为传唱，进一步刺激了大陆流行音乐界。

当时在社会上知名度呈上升趋势的作曲者郭峰，和另外两名好友产生了办一场音乐会的念头。经过紧张的思考和碰撞，一个由大陆百名红歌星参加的大型音乐会，终于在理论上成型。

1986年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和平年”。无疑，这是一个由头，音乐会决定献给“世界和平年”。

准备从两方面开始着手。一是主题歌的创作，一是百名歌手的寻找。

主题歌由陈哲和郭峰等人联手推出，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经过歌手们的检阅后顺利通过。而寻找歌手采用了串糖葫芦的方法，一个歌手再去找另外一个……百名歌手迅速凑齐。

这台音乐会由中国录音录像公司与东方歌舞团合办。

1986年5月9日，北京的天气格外晴朗，工人体育馆作为演出地点成为当日北京的热点。流行音乐迷似乎意识到这台演出的价值，距离演出时间尚早，工人体育馆已被歌迷“包围”，有些人手中拿着钞票，希望幸运降临在自己的头上——或许有人退票？

演出开始了。“想起来是那么遥远……”随着歌曲第一句的传出，全场掌声四起，一双双激动的眼睛盯着体育馆的中央。舞台上云集了当时大陆流行乐坛的百名精英，他们中间有周峰、常宽、毛阿敏、胡寅寅、成方圆、王迪、崔健、赵莉等一批当红歌手。

演唱会大获成功。演出结束后发行的专辑盒带，虽然A、B面只此一首《让世界充满爱》，发行量仍过百万。一时间，中国大小城市，《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声随处响起，人们开始习惯于微笑着聆听过去视为末流艺术的流行歌曲。

1986年5月9日，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节日将停留在世纪的日历里，已经习

惯了低三下四，习惯了忍受拍拍打打的中国流行音乐，终于在《让世界充满爱》的圣洁歌声中树立起正面的形象。这个时期的前前后后，流行歌曲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直至目前的最高峰。

同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这次大奖赛首次将通俗唱法与美声、民族唱法分开评比，客观上等于正式承认和肯定了通俗唱法的存在。也是在1986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首次以肯定的姿态介入了全国第一届“孔雀杯”民族通俗歌曲大奖赛。

这两项大赛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通俗唱法决赛时，大中城市让人有万人空巷之感，电视收视率高得出奇，掀起了社会的流行音乐热。几届大赛为大陆歌坛陆续推出了苏红、韦唯、刘欣如、毛阿敏、杭天琪、陈汝佳、屠洪刚等歌手，并推出《我多想唱》《黄土高坡》等优秀歌曲。每次的比赛过后，获奖的歌手都会成为歌迷认同的歌星，大赛中的优秀曲目也被歌迷广泛地传唱。

在《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会上，当崔健身着黄色军便服出现在观众面前，并拨响手中的吉他时，人们知道，原来只属于西方的摇滚乐已经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中国歌坛。

“我曾经问个不休 / 你何时跟我走 /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 还有我的自由 /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 噢，你何时跟我走 / 脚下这地在走 / 身边那水在流 /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 为何你总笑个没够 / 为何我总要求 / 难道在你面前 / 我永远是一无所有……”

这首由崔健作词作曲的《一无所有》一经唱出，首先便在现场引起了强烈反响。演出结束以后，《一无所有》迅速传唱开来，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也许，对于中国的流行音乐来说，《一无所有》具有与《乡恋》同样的历史意义，它代表了中国流行音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代表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现实性得到发展。同时，崔健也以自己的创作能力奠定了大陆第一个实力派歌星的地位，为以后的歌星发展属于自己的音乐开了先河。

在《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结束之后，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公司和中国东方歌舞团分别推出盒带《一无所有》和《无名高地》，这两盒专辑收录了当时一些极富个性歌手的代表作，其中崔健的《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最后一枪》，王迪的《冲击波》《不觉流水年长》，孙国庆的《山歌》《无言》，王虹的《别

为我送行》，田震的《最后的时刻》，王虹、常宽《血染的风采》等歌曲，成为当时的畅销带。虽然盒带中很多曲目原创性只占一半（国内填词），但由于演唱歌手素质高，领会了流行音乐的真正含义，加之歌词内涵丰富，贴近人生，所以直至今日，这些歌手和曲目仍可认为是代表流行音乐在大陆的较高水准的。

这个时期，流行音乐的原创性很高。社会上，人们乐于谈论郭峰、陈哲在创作《让世界充满爱》时所表现出的才气，此外，以《无言》《不觉流水年长》等歌曲为代表的词作者黄小茂，以及与陈哲密切合作的曲作者苏越，都成为当时流行乐坛的主力创作者，并屡有佳作推出，让歌迷广为传唱。同时崔健的出现，更使歌手自己作词作曲演奏这一模式不再遥远，使流行音乐在大陆极富生命力。

社会终以博大的爱心拥抱了流行音乐这个新生儿。过去灰暗的日子，似乎显得微不足道，在本土创作者才力四射，歌者层出不穷的日子里，歌迷也格外热衷于本土的旋律。《我多想唱》《祈求》《别为我送行》……在歌迷中不断传唱，原先十分抢手的港台歌曲似乎在一瞬间沦为附属的地位。

但是，这种辉煌，对于才诞生了六七年的大陆流行音乐来说，似乎来得过于早了点，我们并没有达到真正的高水准，而掌声已经饱和。不过，在辉煌的日子里，似乎没有人考虑这些问题，大陆流行音乐像一个暴发户似的正在信心十足地炫耀着自己的财富。

辉煌还会持续多长时间？接着而来的将是什么样的日子？当时，没有人在想这些问题。从《信天游》到《黄土高坡》，大陆歌坛吹起“西北风”，如一针强心剂，使歌坛的辉煌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80年代中期，一个日本男影星赢得了大陆千千万万人的喜爱和崇拜，由于对他的喜爱，竟使中国传统的男子汉形象受到一次冲击。他就是以面无表情著称，外看似铁，内看似水的硬汉高仓健。

从南到北，寻找男子汉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时间，面无表情成了中国男影星追寻的银幕形象，而过去曾红极一时的英俊小生，竟被戏称为“奶油小生”，在观众面前“抬不起头来”。

一股阳刚之气莫名其妙地在中国大陆升腾开来。

刚刚在辉煌之中赢得千万掌声的中国流行音乐，似乎很愿意在这般阳刚气之中继续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于是，《让世界充满爱》以后，流行音乐的“西北风”在人们毫无防范的情况之下吹遍全国。

直至今日，仍有很多人把这股“西北风”的源头，看作是崔健的《一无所有》和刘志文、侯德健作词、解承强作曲的《信天游》。但令人惊异的是，对这种看法，无论是崔健还是解承强，都极力否认自己有意带动一股什么风向、一股什么潮流。

崔健的《一无所有》，运用了唢呐等民间乐器，作品整体充满着西北地域的音乐色彩，显得很有阳刚气。作为对过去充斥流行音乐中阴柔气的一种背离，《一无所有》使歌迷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亘古的沧桑。因而，引发了一部分人的模仿和追随。

“我低头向山沟 / 追逐流逝的岁月 / 风沙茫茫满山谷 / 不见我的童年 /
我抬头向青天 / 搜寻远去的从前 / 白云悠悠尽情地游 / 什么都没改变 / 大雁
听过我的歌 / 小河亲过我的脸 / 山丹丹花开花又落 / 一遍又一遍……”

这首《信天游》的歌词，便让歌迷感受到西北风情，加上音乐风格的摇滚化，虽然作为成品收录在《程琳·1987》专辑中，但其阳刚之气仍是遮掩不住。

这两首歌很快在各种场合出现，成为人们十分熟悉的旋律。成功所带来的，是更多的人把眼光投向了塞外曾被冷落的西北。

1987年、1988年，歌坛吹起强烈的西北风，其间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如陈哲、苏越的《黄土高坡》，张藜、徐沛东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我热恋的故乡》等等。

这两个年头，音像出版单位看准了“西北风”磁带的可观市场，想尽办法投靠“西北”，随便站到一个音带销售柜台前，首先进入人们视线的满是“黄土”、“西北”、“乡土”、“西部”等字样，让人无从选择，哪一个才是正宗的西北风味。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 往前走 / 莫回头……”这首《红高粱》的插曲似乎最能代表相当一部分的“西北”歌曲，歌词有无实际内涵已不重要，只要歌手的嗓音沙一些、底气足一些、配器摇滚一些、发泄的可能性大一些，这首歌曲的成功可能便拥有了一半。这就难怪，在演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时，姜文和张艺谋还曾为争夺演唱权拼杀了半天。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大中城市，以“黄土”、“西北”、“红高粱”命名的演唱会此起彼伏，票价一涨再涨，演出仍然场场爆满。这个时期，演出中获得最广泛掌声的，是孙国庆、王迪、田震、腾格尔、范琳琳、刘欢这些大嗓门歌手。那些过去靠唱“温柔爱情歌”而发迹的歌手，在这种局面下，只剩下为“西北歌手”休息时填补演出空当而偶尔出现。

在这两年中，一些港台巨星已经远离歌坛，而正在港台风风光光的歌手，却因为“西北风”占据大陆流行音乐市场而迟迟不能登陆，人们似乎非常有理由为我们自己的作品取得了“胜利”而由衷地感到高兴和自豪。

过后，人们从各种角度评判这股来势汹涌的西北风。有人说，这股极具阳刚之气的“西北风”是对过去充斥歌坛的阴柔之气的一种背叛，代表人们的欣赏品位有所提高。

有人说，这股风潮中的歌曲，最大特点是把流行音乐与中国民间音乐完美地结合，使“西洋品”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因而受到人们的欢迎。

有人说，这和当时文坛的寻根热具有相同的动机。改革开放使世界变化出奇的快，人们在奔波中忘了从哪里来，也忘记了要去哪里，于是就产生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类的疑惑，因而，西北成为一种根的象征，被众多人在潜意识中去认真寻找。

还有人说，这两年天灾不断。大兴安岭火灾、南方水灾、“火车亲嘴，飞机打滚”，物价飞涨，一次又一次抢购出现在各个城市，人们在动荡不安的心情里需要一种发泄，一种放松的吼叫和嘶喊，而“西北风”正好迎合了这样一种心理。

无论人们是褒还是贬，以今日的眼光回头去看，恐怕“西北风”对大陆歌坛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

从创作上来说，“西北风”第一次让创作者开始寻找流行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沟通。流行音乐不再单纯的是一种“外来品”，而具有了很多我们自己的风格。从这一点上来说，“西北风”为以后大陆歌坛发展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引导。

从流行音乐市场来说，风风火火的“西北风”吸引了更多的人成为流行音乐迷，根本不成熟的录音盒带出版被刺激得迅速发展，而成今日的蓬勃发展之势，这一点，恐怕是当初投身“西北风”的人所没有想到的。

然而，“西北风”只吹了两年。这股风过后，人们看到了天空中出现的“台风”迹象。

歌坛开始有些不安。

潮来潮往：却道作今不如昔

《从悔恨的泪》到《麻坛新秀》，流行歌曲在大陆变了味，俗、邪、土在短期内成了流行音乐的主流。过早辉煌的大陆流行音乐终于在这种畸形发展的打击下，露出先天不足的病弱面目。

风潮毕竟只是一种时尚，而时尚往往是不会停留太久的。流行音乐在大陆的发展尚不足十年，创作人员的缺乏，使“西北风”经历了短期风光之后逐渐降温。到后期，西北一些民歌都被重新配器之后冒充“西北风”来蒙骗听众，“西北”、“黄土”之类的磁带开始出现在降价品的摊位上。

但钱还是要赚的，磁带还是要出的，流行音乐慢慢变了味，开始向“邪”、“俗”、“土”的方向发展。歌迷的心态也让人匪夷所思，一段时间内，竟以愉快的心情接纳了这些“残次品”。

《红塔山和葡萄皮》是由田震等歌手主唱的一盒顺口溜式专辑。发财、个体户等内容出现在专辑内，歌词更是以大白话、民间俚语为主，这种无太大艺术意义的作品竟奇迹般的发行过百万。这期间，还有类似《麻坛新秀》《大老爷们爱唱歌》之类的歌曲，也由于迎合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某种心理而挤进了畸形畅销的行列。

迟志强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名青年演员，曾经主演过《夕照街》等影片，属于影坛新秀这一级别。可惜的是，这位本应在电影界继续发展的年轻人因流氓罪入狱。没想到，出狱以后正赶上流行音乐风格缺乏，市场销售吃紧，于是，一些人打着迟志强的牌号，以他在狱中的生活经历为主题，推出迟志强专辑《悔恨的泪》，这盘“失足专辑”的发行量又奇迹般的突破百万，掀起了一股“囚歌”热。

上海的张行，在80年代初期，曾以《成功的路不止一条》专辑创下国内发行纪录，后因流氓罪同迟志强一样走进监狱。出狱之后，市场上似乎很流行有这样“失足经历”的歌手唱歌，于是，张行又风风光光地走进录音棚。

市场上，《悔恨的泪》《铁窗泪》《囚歌》之类的盒带十分走俏，导致流行

音乐误入歧途，最后终于暴露出穷途末路的面目，为港台歌手再次大规模走入大陆，创造了最好的内部环境。

其实，“西北风”也好，“囚歌”也好，都同样显现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不成熟。《一无所有》一出现，《信天游》一走俏，全国四面八方便都是“西北风”；《悔恨的泪》一出来，“囚歌”风便铺天盖地。这种一窝蜂现象说明了大陆流行音乐的风格缺乏，品味单一。当各种风潮最初出现时，暂时以新鲜感吸引了大批歌迷，但时间一长，各种音乐风格都被统一到“西北”、“囚歌”的范围里，终于使歌迷的胃口不堪负荷。而这个时候，贫乏的大陆流行音乐又无法再创造出新的风向来稳住歌迷，大陆流行乐坛出现了真空状态。

谁来填补这种真空？

此时港台的流行音乐已经完成了一次变革，过去仅仅“你情我爱”的内涵已向多元化内容发展，罗大佑、童安格、王杰等一批实力派歌手和谭咏麟、张国荣等偶像巨星一直等待着时机闯入大陆。

现在，时机终于成熟。

当“西北风”降温，“囚歌”无力之时，大陆流行音乐工作者只好眼睁睁看着港台歌曲乘虚而入，开始在大陆歌迷心中“横行霸道”，大陆歌迷兴高采烈地成为港台流行音乐的俘虏。

大陆流行音乐发展的一个尴尬阶段：“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时期就这样悄悄开始了。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面对外来歌星的排挤，面对眼前伸手可得的金钱，一些歌手忘记了身上的责任，开始自拆舞台，阻挡前行的脚步。

当《让世界充满爱》献给了世界和平年以后，得宠的歌星们开始成为音像出版社、演出采访、晚会争夺的焦点人物，流行音乐逐渐开始成为一些人的发财手段。由于巨额的报酬，歌星们当然乐于“被人利用”。神州大地，开始了明星大走穴。

A君，原属北京某歌舞团，属于不入流的乐手。前些年，由于业务不精，加之油腔滑调，因而颇不得人注意。怎料风水流转，发财的机会自寻上门来。

某一天，A君过去的同学找到他，问他是否可以通过平时圈内的关系网，“编织”出一台文艺演出的人员表来，好到外地演出几场，其中要有一两位当红歌星，其余可稍差，事后报酬可观。

A君心领神会，随之运用平日油腔滑调争来的关系网，收罗了大小八位